



◎广东东莞市工商联副主席 梁德堂 郑志波 / 摄

世界莞商大会 6 月启幕

□ 龙权

广东东莞市工商联副主席梁德堂近日在接受媒体集中采访时透露,首届世界莞商大会初定于 6 月 27 日至 29 日在市会议大厦举行。梁德堂说,届时全球优秀莞商代表、国家及省市领导和世界著名专家学者共 1300 多人将齐聚东莞,向世界传递莞商品牌和莞商精神。活动期间,主办方还将举行颁奖盛典、高峰论坛等活动。

首届世界莞商大会为期 3 天

据东莞日报报道,梁德堂表示,由市工商联会同市委统战部向市政府提出举办的首届世界莞商大会,从去年提出,到初定今年 6 月 27 日至 29 日举办,已得到市政府同意。这一由市政府主办,市委统战部、市经信局、市工商联等部门承办的大型活动,现已由承办单位抽调专人组成了首届世界莞商大会秘书处,负责活动的具体开展。

“活动为期三天,活动包括欢迎宴会、文艺表演、大型开幕式、颁奖盛典、高峰论坛、莞商产品展览、项目签约、考察交流等。”

梁德堂介绍说,大会将邀请国家、省市相关部门和行业的领导、专家,在世界各地经商的莞籍企业代表,在莞经商的世界各地企业代表,本土的民营企业代表,以及世界知名专家、学者约 1300 人与会。对于本次大会,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建华在 2 月 29 日召开的市委统战工作会议上曾说,办好首届世界莞商大会,对打响莞商品牌,增强莞商凝聚力十分重要,要确保首炮打响。

向世界推介“莞商品牌”

“通过这样一个平台,促进莞商交流合作,弘扬莞商精神文化,扩大莞商品牌影响,引导莞商做强做大。”梁德堂介绍说,莞商低调、沉稳、务实的性格,与浙商、温州、徽商等国内知名商帮有很大差别。

伴随改革开放崛起于珠三角、扬名于全球的“莞商”,泛指世界各地的所有东莞籍商人及在莞邑大地上创业的商人。与港商、台商等外来商帮不同,莞商是改革开放后从南粤大地上崛起最快、活力最强、影响最大的群体之一,在我国香港、东南亚、日本、美洲等世界各地都能看到东莞商人的身影。面对数量众多、影响力巨大的东莞商帮,如何增强莞商凝聚力、抱团发展,扩大东莞民营企业的影响力,特别是为东莞实现高水平崛起献言献策,是举办首届世界莞商大会的主要目的。

“首次举办如此大规模的莞商大聚会,市工商联会全力以赴。”梁德堂说,工商联作为经济建设的助推器,是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办好世界莞商代表大会,对打响“莞商品牌”、推动莞商联合发展都有好处。

传递价值 成就你我

芙蓉王

文化头条新闻

湖南芙蓉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版面导读
Banmian Daodu

02 豪车俱乐部 汇聚精英「小圈子」
中国富豪海外狩猎流行

04 中部投资牵动世界目光
S 店为「载体」私人飞机「破冰」

A2 风生水起新闽商
一条街道与五个民间商会的故事

B1 B4 郑伙霖 做实在的商会事
浙资回援 商会助力

蔡金山 商界比拼 赢在“速度”

□ 卢雁菲

在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副会长、金达吉瀚集团董事长这样光鲜亮丽的美名之后,我所深入了解的蔡金山同很多普通年轻人一样,不是富二代,亦没有可以依靠的关系网。他只能靠自己的努力解决生存问题,甚至需要加倍的付出来改变一家人的生活状况。

[详见 B4 版《商睿》]



如果在家族内部确立无力解决控制权的传承,那么,中国民营企业能否建立起超越血缘关系的信任呢?

中国式传承难题待解

□ 史川轩

最近,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余明阳的团队发布了一项调研结果,调研对象是国内 182 家在各行业排名居前 3 位的杰出家族企业,还针对其中 54 个家族企业的接班人状态进行剖析。

结果发现,创业的一代企业家平均年龄为 52 岁,未来 10 年,中国家族企业将全面进入“二世”时代,然而,多达 82% 的“富二代”表示不愿主动接班,其中,部分“富二代”的理想是“当官”。

“富豪超生”

来自 21 世纪经济报道的消息称,家族企业素有“一代创业、二代守成、三代衰亡”的“三代消亡律”一说。现在多数民营企业,依然会把“子承父业”看作是天经地义的第一选择,“富二代”们“守业”意识的群体性淡漠,会对中国家族企业的生命周期产生消极影响,而此种影响又被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放大了。

由于现行的生育政策,中国家族企业直系的继承候选人数量非常少。近年来,虽有新贵阶层为其家族事业传承预留伏笔,“富豪超生”现象普遍,但是相当部分早期创业者,仍要面对只有一个孩子的现实。中国单个家庭人口数量在持续减少,平均每个家庭的人口规模从 2000 年的 3.44 人下降到 2010 年的 3.1 人,即使创业者愿意将继承范围扩展至家族至亲,选择范围依然有限。

已有研究证实,候选人数量会影响企业换代的成功率。曾有一项调研发现,如果创业家庭没有直接后代,他们通过把企业交给后代亲属或家族外成员有



28% 的概率成功;如果只有一个孩子,那么他们的换代成功率为 30%,而他们如果有 4 个或 4 个以上的孩子的话,换代成功率可以接近 40%。

传承“困扰”

当然,子女人数只是影响传承成功与否的一个因素。事实上,现行生育制度,对于中国家族企业不全是负面的。中国历史上众多大家族历经百年仍然血脉相传,却难以累积大规模资本,不少学者就将其归咎为家族财产为多个子女“分家”的结果;如果父辈生前缺少系统性安排,一旦离世后,多个子辈间缺少权威,又往往容易“闹家务”。相对来说,有限甚至是唯一的候选人,其实简化了所有权的继承。但不容否认的是,如果希望维持家族的有效控制,那么如此少的选择,依然会困扰相当部分的中国企业家,当缺少值得托付的外部人备选时,这种担忧尤其严重。

这个问题的一种常规解决路径在于,尽早制定计划,提升家族内部候选人的继承意愿和能力,毕竟,基于血缘关系

的信任感和忠诚度,往往是外部人员难以企及的。但是,鉴于余明阳团队的调研结果,如果在家族内部确立无力解决控制权的传承,那么,中国民营企业能否建立起超越血缘关系的信任呢?

“准家族式”

已经有学者将亚洲存在的家族式企业分为“家族式”和“准家族式”的,后者以日本为代表,有研究指出,在日本,家庭的权利不传给亲儿子而传给过继者的比例高达 25%-34%,创业者可以将长期的可靠、有能力的学徒、仆人视作家属或选择为过继者,使得其候选人的选择范围扩大,但是,日本“准家族”超越血缘关系的出现,与其强调“忠”的文化特性相关,以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经验来看,日本的模式恐怕很难在文化更重“孝”的中国内地复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职业经理人文化,移植到中国恐怕也需要一个漫长的本土化过程。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伴随中国家庭的“原子化”,传统家庭文化的信任关系正被更广泛的社会网络所代替,比如同乡、同学和朋友。这在异乡人集中的中心城市尤其明显,比如,基于同乡关系的“商帮”意识就在重新崛起,类似浙商这样的群体就经常“抱团”,采取一致性行动,降低市场风险,这种互惠关系未来是否有可能成为各家族企业之间的战略性关系网络(比如,出现交叉持股的现象)的肇始? 如果是,那么单个家族企业控制权传承,就有可能被这种战略性关系网络部分消解。换言之,像“温州炒房团”这样的群体性现象,或许部分暗含着解决中国式传承难题的密码。

记者从推介会上获悉,首届世界晋商大会预设规模 1000 余人,确定 100 个重点项目,涉及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多个方面。

召唤全球晋商“回家看看”



□ 梁波

“湖商、徽商、浙商此前都开过大会,晋商大会的召开时机也已成熟。”中国侨联副主席王永乐近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届世界晋商大会执委会新闻发布会暨招商项目推介会上表示,将全力邀请海外企业家同赴盛会。

由山西省委、全国工商联、中国侨联,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办的首届世界晋商大会

将于今年 8 月 19 日至 20 日召开,大会以“新晋商、新山西、新跨越”为主题,采取组团招商、商会招商、园区招商、融资招商、招才引智等方式,招引全球晋商“回家”。

记者从推介会上获悉,首届世界晋商大会预设规模 1000 余人,确定 100 个重点项目,涉及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多个方面。

当前,中国能源大省山西强力推进产业转移,此次确定的 100 个项目在农业方面重点围绕畜牧、蔬菜、小杂粮、干鲜果等;

在工业方面重点围绕比较优势突出的先进装备制造业、现代煤化工、新型材料工业、特色食品工业等;在服务业方面则重点发展文化旅游和现代服务业,拟发展打造中国中西部现代物流中心、生产性服务业大省。

山西人从商历史悠久,从明朝初年至清朝末年,晋商以纵横商界 500 年的辉煌业绩名震中外,不仅是国内实力最强的商帮之一,也是中国国际贸易中一支具有竞争实力的地方商帮。时至今日,富士康领袖、祖籍山西晋城的著名台商郭台铭,全球最大中文搜索引擎百度掌门人李彦宏等,均被视为重量级的新晋商代表。

目前全球分布着 50 余个晋商商会组织。山西省统战部部长聂春玉表示,希望借此大会,建立起海内外晋商沟通交流的平台和回乡投资发展机制,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晋商组织起来,凝聚全球晋商力量,促进晋商之间合作,把企业做大做强。

据悉,大会期间还将举办高峰论坛,开展“回家看看”海内外晋商项目考察与寻根观光活动等。

视野 | Shi Ye

浙商转型与 给予新“空间”

□ 张立伟

推动“浙商回归”已经是 2012 年浙江省政府的“头号工程”,这是一项与多年以来招商引资类似的政策性工作,只不过浙江将招商的对象限定在了省外的浙商。为推动这项工程,浙江省各级政府除了为回归企业制定了税收、土地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外,还启动对 11 个市,20 个省级相关部门以及 29 个省外浙江商会的目标责任制考核。

浙江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与江苏主要以有技术实力的外资企业不同,浙江主要是低端民营出口加工企业,这些企业对成本极为敏感。随着当地土地成本以及中国资源价格上涨,本应被淘汰的小型民营企业被迫大量外迁,寻找更便宜的制造基地。这造成了浙江产业空心化,资金外流并呈现热钱化。

这是非常典型的转型困境,浙江、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率先遭遇。在制造业产能过剩的中国,尤其是生产成本不断上涨的条件下,能够招商到的境外产业资本已经非常稀少。浙江希望通过政策导向,吸引浙商回归帮助重振实业,比如“省政府确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浙江省重大浙商回归项目,由当地优先安排用地指标,待项目工地手续完成后,浙江省给予一定的指标奖励”。

显然,地方政府的发展诉求与浙商群体之间是不太匹配的。很多浙商主要以低端制造业为主,而累积一定资本的商人大多转向资产炒作与地产开发,他们大都缺乏现代服务业的经验与技术,投资于新兴战略产业的更少,他们更像是一群商人而非企业家。除了资本之外,浙商对于浙江转型所需要的技术升级与创新很难提供什么帮助。

中国地区间的政策因竞争而呈现不同的状态。地方政府们以税收、土地以及其他资源产品的优惠,吸引产业资本,但这可能会扭曲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如果一地重启区域性政策竞争,值得商榷,而且地方政府很难有更多的财政资源支持这种做法。与此前不同,这种难以促进升级的招商不支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浙江应该向境外企业开放服务业,他们有资本和经验,对于改善浙江经济结构、推进产业升级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应该开放金融、文化、医疗、教育、交通等产业的管制,允许民营资本自由进入,否则,引导浙商资本回流仅仅是让他们重操旧业吗? 应该给他们一片新的服务业的空间。

中国需要放开产业管制和国企垄断来打开一个增量的空间,地方政府所能动用的经济资源已经使用得差不多了,传统的投资拉动模式接近尾声。中央政府需要加快改革,单凭地方政府很难像以前一样有能力推动经济的发展和转型。

(据 21 世纪经济报道)

西部首选

雄厚资金寻优质项目,免抵押,可风险投资,手续简捷,个人、企业项目不限、地域不限。

电 话:028-68000128